

社会时空观视角下的疫情防控与经济民生

严新明 童星

2020年1月23日，鉴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严峻形势，武汉市实施“封城”，机场、火车站、轮船码头和所有公路的离汉通道关闭，全国各地进入武汉市的水陆空客运暂停。紧接着，全国各省份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停摆”。刹那间，物理空间遭阻隔，社会时间被冻结。

疫情暴发正值春节“黄金长假”期间，尽管封城、管控交通、叫停人员聚集导致许多大家庭过年不能团聚，春节传统习俗活动难以进行，但对于绝大多数小家庭而言，忙碌了一年正好歇歇，久违了的家庭亲情终于回归。对劳动者来说，时间所有权通常依照二元关系来定义：业主的时间，即用于工作的时间；自己的时间，即用于休闲的时间。在紧张的防疫形势下，不能出门、宅居家中的人们还曾乐观地表示，“终于可以躺在家里为国家做贡献了”。

延续多次、史上最长的春节假期结束后，人们复工复产的需求迫切，因为毕竟休闲的物质基础在于工作，没有了工作和收入，生活都无法维系，谈何休闲。但是，疫情让复工复产困难重重，无法到达工作场所、自己的时间无法用在工作中的焦虑开始出现；随着我国疫情得到遏制、复工复产取得进展，全球疫情却愈演愈烈，来自国际上的订单大幅减少，产业链纷纷断裂，复工复产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社会时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成就可以从社会时空来理解，扶贫脱贫可以从社会时空来入手，民生保障可以从社会时空来深化，新冠疫情形势下复工复产、经济民生的症结也可以用社会时空来解析。

一、社会时空的理论探索

时间和空间可以划分为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的经典理论奠基于牛顿，创新成果得益于爱因斯坦。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经典理论则可溯源自马克思，发展于当代诸多学者的研究中。

（一）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运动存在的基本方式。基于唯物主义立场，他坚持自然环境先在于人类社会，由于有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才使时间与空间具有社会现实性。

自然时间具有客观性，社会时间仅具有似客观性。也就是说，客观的自然时间长短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表现为分秒不差的钟表时间；似客观的社会时间则表现为劳动时间，在有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则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社会时间的直接量度，那么似客观性的社会时间必然因人而异。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让空间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具有了社会性，社会空间则是人们赖以获取经济利益的社会实践领域或具体空间。

（二）社会时空理论的持续发展

如果说牛顿的自然时空观向爱因斯坦的自然时空观的发展是由科学实验推动的话，那么，社会时空观也是伴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生产实践不断持续发展着。

1. 社会时间的观念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劳动、生活与亲情交织，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融合。工业化以来，规范的钟表时间成为劳动者的外在强制力量，社会时间则等价于劳动产品出售时所能换回的金钱，社会时间同自然时间分离，而与金钱紧密相连。时间与金钱之间的等号在机器运转中生效，社会时间被描述为一种可控的稀缺资源和决策中的“压力”，就像商品一样，可以被人们积压、拥有、交换、失去、节省或浪费。随着贸易的发展、金融的创新和全球化的推进，时间与金钱之间的等号广泛存在于分工精细、交叉重叠、错综复杂的组织体系中，并随时得到“弹性”的、重新的配置。社会时间的可自由支配性从投资、市场开发、商品销售直到服务提供而逐步扩展开来。社会时间则成为一种高级的财产、高级的商品，被人们买卖着，并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再生产功能中被组织起来。在网络时代，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 Castells）指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更具体地说，在现代社会，付薪工作时间建构了社会时间。”

2. 社会空间的观念

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也在不断拓展着社会空间。

(1) 农业时代的社会空间。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差别不大。随着现代生活速度的加快，地理条件即自然空间的重要性不断降低。洛克（John Locke）最先提出人类财富的增加已不再取决于所占土地的扩大，而取决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就是指，农业时代后期社会空间开始与自然空间（土地面积）分离。

(2) 工业和服务业时代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真正分离，源于城市及其所孕育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城邑所占有的是一个特定的空间，与农村的空间完全不同。这取决于生产方式，以及通过生产方式，取决于社会内部的劳动分工。城市的工商业劳动，从其产量特别是产值来看，证明了城市的自然空间可以很小，但社会空间却足够大，可以容纳劳动者一生的职业生涯。列斐伏尔解释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社会空间，包括都市的空间、娱乐的空间、教育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等等，它们相互渗透、相互重叠，却不相互限制。

(3) 都市化、全球化时代的“超空间”。在总结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和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社会空间理论观点基础上，冯雷指出：20世纪出现了三种新的社会空间形式：都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超空间（hyperspace）。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导致新的空间形式——超空间的出现。我们习惯于其

中的地理、物理世界是时空统一的，超空间恰恰是空间和时间分离了，其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空间的非连续性、事物的虚拟性。超空间中的物体或事件不具有时空统一性，也不遵循地理临近性原则，如在欣欣向荣的技术开发区的周边，是一派经济凋敝的景象，但开发区的繁荣却惠及他国某地。

（4）网络社会空间。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经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服联网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空间。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会本身不受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同时，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了现实社会互动对地域的要求，使得跨地域的人们瞬间实现互动，拓展、延伸了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和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伸延理论、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曼纽尔·卡斯特的流动空间与无时间之时间理论应运而生，人们对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全新的社会时空充满好奇、不断探索，积极推动生产实践的发展、新业态的诞生。以电子商务为例，迅速发展中的信息技术往往被视为有利于“大规模定制”“一对一营销”，以及长期“营销关系”的发展。威甘德（Wigand）将电子商务描述为能为个性化互动和达到自发的“市场空间”创造独一无二的机会。网络空间消除了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物理限制，提高了双方互动的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大有可为的市场空间。作为互动媒介的网络空间“不仅是认知的空间，也是行为的空间和体验的空间”。文卡特什（A. Venkatesh）等人描述了“百分之八十的互联网现在

是如何完全被商务商人所占领”。近些年来，位居中国“胡润榜”前列的富豪也陆续由房地产巨头换成了网络大鳄。

二、疫情前的中国社会时空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时空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其动力源于农村经济领域的改革、城乡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积极跻身于国际市场。

（一）农村改革：家庭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兴起

如前所述，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尚未分离，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吃大锅饭、绑在一起穷”的局面，在承包的土地这一面积未变的空间中，农民们自主决定种什么、怎么种，提高劳动效率，开展多种经营，使社会时间同自然时间相分离，从而让生活逐步好起来。

初步摆脱贫穷的中国农民没有满足于农耕家计经济，继续探索创办乡镇企业，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在农村开拓工业社会空间。早在1987年4月，邓小平就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得以分享工业时代的社会空间，将从事农业生产剩余的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从而走上致富之路。

（二）市场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开辟出大量的社会时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再是唯一向社会成员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社会逐步成长为与国家相并列的另一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这种变化来自“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而“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则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当市场取向的改革推行以后，城乡劳动者向更广泛的社会空间进军，实现了更多的社会时间。

通过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现，农业技术进步使一个国家只需15%的人就能生产出全体国民所需的口粮，农村人在务农之外的时间多起来，也就是说农民有大量的自然生理时间不能转化为社会时间即金钱财富。农业技术进步必然使城市人口增加，进而带来城市职业的增加即社会空间的扩展。城市规模越大，则人口越多，职业越丰，社会空间越广阔。农业的人均收入通常低于制造业的人均收入，服务业的人均收入又超过制造业的人均收入。城市的大门一旦敞开，农民定会进城务工经商、提供服务，分享城市社会空间。由于务工经商、提供服务等活动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劳动者可以长年累月地劳作，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时间。

截至2019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7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4247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为57.1%；农民工总量29077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425 万人，本地农民工 11652 万人。城乡劳动者在工农业社会空间、服务业社会空间、网络社会空间中共同成就了国家的经济体系，实现了自己的社会时间，获得了自身的经济利益。

（三）加入 WTO：社会空间由国内扩展到全球

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二战”以后表现出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社会空间以及超空间的相互渗透。加入 WTO 可以说是很好地拓展社会空间的过程。2001 年 12 月 11 日，经过长达 15 年的艰难谈判，中国终于被接受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加入 WTO 为中国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凭借巨大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成本优势及强劲的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中国对外出口实现了快速持续增长，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借助“超空间”概念，比较容易理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内涵和成就，中国劳动者面对的社会空间扩展了，在国际的社会空间中实现自身的社会时间。中国的国际贸易及国内生产总值也迅猛增长。中国货物出口额从 2000 年的 2492 亿美元跃升到 2016 年的 2.01 万亿美元，在世界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从 3.3%提升到 13.1%，排序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一位；同期进口贸易额分别为 2250 亿美元和 15879 亿美元，在世界进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分别为 3.38%和 9.83%，排序跃升为第二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2000 年突破 10 万亿元，2010 年达到 41.2119 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 年又增长为 99.0865 万亿元。

三、疫情后的中国社会时空结构

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能量导致社会空间急剧扩张，社会时间不断加速。在这个“陀飞轮社会”中，步调比目的地更重要：谁保持原速，谁就停滞不前；一切，尤其是时间，将会快速运动：新的神话就是速度。然而，2020年1月下旬以来，武汉市的封城，全国的禁足，全球产业链的断裂，却令“陀飞轮”戛然而止。

（一）基本不变：农业社会空间稳定，农民有序实现社会时间

由于疫情暴发临近年关，绝大多数农民工都已返家过年，节后出行困难，这正好为春耕生产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在2月23日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抓好春季农业生产作出指示。农业社会空间基本稳定，居家农民有序实现社会时间，为全年农业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我国粮食安全有充分保障，要抓好农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夯实农业基础。问题是，农民想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实现社会时间、获取更多的收益，这一点变得困难了。

（二）明显恶化：自然空间隔离影响生产生活，工业产业链断裂，多项服务业停摆

疫情防控既切断了病毒传染渠道，取得抗疫的决定性胜利，也造成自然空间的隔离，给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带来负面影响。由于交通不便、出行困难，城乡劳动者都很难顺利抵达自己就业的地方，在自然空间方面都难以到达，在社会空间方面就更加难

以获得。这样一来，劳动者自身的生理时间就难以转化为社会时间。

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防控工作、复工复产作出规定。此后一系列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3月4日，中央进一步强调“根据疫情分区分级推进复工复产”，“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为实现疫情防控和稳定农民工就业“两不误”，确保“输出有组织、健康有检测、乘运有防护、到达有交接、全程可追溯”，浙江、广东等省及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通过“点对点”方式助力外来民工顺利返回企业复工。3月1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称，各地企业复工率和员工到岗率稳步提升，已有1亿农民工外出务工，占春节前返乡农民工的80%。

可是，数以亿计的城乡劳动者克服了自然空间隔离之阻，却仍难以获取社会空间，难以将自然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原因在于：

1.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国家本着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的原则，对湖北省和武汉市进行了最严格的管控。与此同时，对全国各类单位、各类人员采取延长假期和杜绝聚会娱乐流动等活动的方式，很快遏制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有效控制了疫情。由此使各类商业服务、文化娱乐活动全面停下来；其后通过行政命令逐步分批允许恢复，但人们对于去商场购物、饭店堂食、旅游观光等活动，动机明显减弱，实施起来也困难重重，社

会空间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到原有水平，所涉许多相关产业劳动者社会时间的实现非常困难，更遑论增长。

2. 2020年1—4月，受疫情影响，我国进出口总额9.07万亿元，下降4.9%。其中，出口4.74万亿元，下降6.4%；进口4.33万亿元，下降3.2%；贸易顺差4157亿元，减少30.4%。在我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有力推进的同时，疫情在全球传播蔓延，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阻碍了人员、商品的有效流动，对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造成打击，这大大压缩了工业社会空间和“超空间”，从而影响城乡劳动者社会时间的实现。

（三）持续向好：“互联网+”，电商、快递、网络教学、会议、游戏等利好

疫情防控需要不同程度地阻隔自然物理空间，却不仅不阻隔反而依赖网络社会空间。在自然空间管控严格的形势下，互联网企业表现出担当，获得了业绩。据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介绍：从海外直接采购医疗物资，定点送往武汉及湖北的医院；积极从货源、仓储配送、平台管控等各个方面全力保障相关物资供应和价格稳定；提供时空大数据及分析技术，支持对疫情的及时发现、快速应对及科学管理；启动援助物资保障小组，为救灾物资提供免费运送、全力保障全网运输效率；提供在线办公设备，支持视频会议、教学活动；疫情期间免费提供线上课程惠及大量学生。另一方面，在宅居和禁足中，人们借助互联网的线上活动变得活跃了，包括信息交流、视频观赏、游戏活动等；线下的物流快递

逐步恢复后，人们的网购行为大大增加；在与复工复产相伴的复学中，线上的教学、会议等也繁荣起来。所有这些，都有利于相关产业、企业和劳动者的社会空间扩展、社会时间实现。

四、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有关经济民生的社会时空对策

早在 2020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从社会时空观的角度看，其意就在于快速恢复社会空间，让劳动者实现社会时间。

（一）努力做好复工复产

4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经济工作后将有关意见提交两天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首次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4 月 20 日至 23 日，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强调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

从社会时空角度看，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就是保劳动者的社会时间。劳动力，或者有收益的工人，或者在经济上积极活动的人口，这三个术语是交替使用的，都是指“为生产经济财货和劳务提供有用劳动的所有男人和女人”。既然为社会的“生产经济财货和劳务”提供了“有用劳动”，这些“男人和女人”的自然生理时间就获得了社会的承认，转化为社会时间。因此，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做好复工复产，是努力恢复并增加社会空间，让更多劳动者实现社会时间、获得收益的根本途径。

（二）修复与重建产业链、供应链

正如自然物理空间具有连续性一样，社会经济空间的连续性就是产业链、供应链。在几十年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中，我国产业工人被训练出较高的素质，而且还具有成本比较优势，作为经联合国认定的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已具备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体系，并且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中。此次疫情在我国中间品供应链上撕开了一个“口子”，也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考全球产业链重构格局下未来的发展路径。

8月24日，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基于：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外循环的地位已被“腰斩”，改革开放以来运行的那种原料来自国外，经加工后的商品又销往国外的贸易模式，在我国的进出口总值中，比重已由1998年的53.4%下降到2018年的27.5%，现在还在继续压缩之中；另一方面内循环需求剧增，我国的市场份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20%；如果按市场汇率计算应该是16%，2020年还可能会上升。这就要求我国在形成国内要素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等方面，积极打破壁垒，推进相关产业的重组、升级，尽快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外循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以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2020年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7227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7%。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努力做好复工复产、推动双循环，我国“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了在全世界都不易看到的经济成绩。

在全国抗疫过程中，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VR等新技术，以及远程诊断、线上交付等新模式、新业态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动力。当前，无论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都在逐步完善本土产业链，以降低对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依赖。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而是要充分认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位置，认识和把握全球产业链发展方向，找准突破口，集中力量布局新技术的产业生态，同时，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重建产业链、供应链，必将丰富我国的社会空间，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实现社会时间。

（三）依靠互联网技术开辟新社会空间

疫情初期对互联网行业形成了短期冲击，企业面临业务下滑和成本上升的双重困境。中长期看，互联网行业未来发展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由于基于网络空间提供的供销信息，让网络市场避免了物理空间隔离带来的交易障碍，更利于供需双方的交易，因此，疫情以来主要的互联网公司的销售额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出现逆势上升的势头。互联网企业通过创新，数字经济的新业态及

新模式正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线政务、线上教学、网络购物、跨境电商、网上娱乐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学习、休闲的新方式，在此过程中互联网企业业绩表现很好。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 80065 亿元，同比增长 9.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4 个百分点。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66477 亿元，增长 15.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3%”。依靠互联网技术开辟新社会空间，可以让更多的工农业、各类服务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时间。

复工复产，重建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充分发展互联网经济，使我国“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898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99.8%”，劳动者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实现了社会时间，这一成就实属不易。

（四）实施社会保障，对难以自立者直接赋予社会时间

在当代，社会时间体系主要由市场和国家来确定。市场通过所要做的工作以及时间与金钱的交换关系来安排社会时间；国家则通过立法执法来发挥对社会时间体制的影响，并以此建构民众的生活，如老年人的“退休期”就是经过预先筹资的时间。从劳动和社会保障角度看，在劳动力市场中，正是某人的失业状态（包括这种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关乎什么能力，由什么所造成）决定了他或她在生病、发生意外事故、失业和年老等情况下，是否在什么程度上有权从社会保障体制中获益。针对那些未受这种劳动保险体制泽被的人，各种补救措施纷纷出台。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因社会空间受限影响了自身社会时间实现的人，更多的是城乡普通劳动者，他们就业的流动性强、收入低、保障程度弱，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可能陷入困境，急需政府和社会的关心和保障。

1. 对务农的农民，要肯定其种植养殖的经济、社会意义，考虑到疫情防控常态化对其经济收益的影响，在“粮食直补”等常规补贴的基础上，给予临时性补助。

2. 通过网络的大数据比对，对未能就业的城乡劳动者，分两种情况进行保障：已进入失业保险的，失业保险金的发放要及时到位，根据疫情防控的情况，由财政负担，适当提高失业保险金待遇；没有进入失业保险的，由财政负担，发放临时就业补助金，数额可高于最低生活保障、低于失业保险金。

3. 老年农民的年金水平达不到养老的基本要求，国家可以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标准。

4. 对于低幼年龄人员，许多国家有儿童福利或家庭福利，为家庭抚养儿童减轻负担，也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福利资金支持。当前，国家可以考虑对低幼年龄人员实施一定的补助。

5. 面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一些国家采取直接给公民发现金等办法，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复苏。我们建议：（1）可以基于每个公民的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如 2019 或 2020 年度），返回一定比例的个税。（2）对无个人所得税缴纳记录的公民，也确定一个基本金额数予以发放。获得返还或发放的公民在

获得发放款后 2-3 个季度必须将其消费掉，否则由税务部门收回。此办法操作简便，利于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复苏，利于广大劳动者社会时空的获得和实现。

2020 年 5 月 28 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我们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 3 万元人民币，但是有 6 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 元左右，并特别强调一定要保障困难群众和受疫情影响的新的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筑牢民生保障基础。